



鄧小平的淡毛創新

金思愷

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註一）這一種實用主義，可以作為淡毛創新意識型態的哲學概括。淡化這一名詞與毛澤東思想聯繫起來，只說它是淡而非棄的實質；創新則是改革開放。

毛澤東思想的淡化，使中共的思想、組織的控制鬆弛，僵化體制解凍，改革開放徐徐進行。這一種自恣性（註二）的控制鬆弛，在名義上使其統治由黨轉向于行政性控制，本來可以兩不相干。

但由於中央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行政系統也受到了思想、組織鬆弛的影響；此一影響則隨著個人背景、智慧差別有所不同，不像以前可以通過思想改造使之一致。這種不一致表現為幹部

對改革開放的複雜而不均衡的對策，矛盾與制籜不斷地出現，阻撓其順利發展。

本來，鄧小平早就訂下了四項原則防止改革開放的失控，由於幹部對策不均衡，使得四項原則的執行也時鬆時緊，這方面鬆、那方面緊這種不一致。近年，由於特權幹部肆無忌憚，在經濟改革方面，這四項原則的控制，也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在改革開放中，當權的老幹部留戀於自己打出的天下，壓制了民主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開展，對於經濟改革，阻力較小。這樣，就使政治、經濟改革開放不均衡。

經濟改革於某種程度上否定了集體利益，鼓勵

了個體發展，但擴大形成爲「一切向錢看」的意識滲透入整個控制已鬆弛的行政系統，使得具有執行政策特權的幹部，以有利於自己經濟利益這種對策來決定如何執行。

由於改革開放使得社會主義較高階段退回到初級階段，但強調要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當然無從作實踐檢驗，實際上，成爲形式主義的工作。現在這種形式主義亦在整飾紀律工作方面普遍流行，加上思想改造已經淡化，再要求批評與自我批評，又是迫人「走過場」。這樣，就使得依據自己喜惡來執行政策的幹部肆無忌憚。

具有上述條件的特權幹部，建立起自己的特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同時這種經濟之出現具有異化本質也是顯見的。

這樣，本文是從毛澤東思想淡化、四項堅持與改革開放的矛盾及異化經濟在發展這樣的順序來編述。

總起來說，鄧小平的淡毛創新，實際似在敦促

異化經濟的發展，這當是出乎他預期之外的發展。

毛澤東思想的淡化

在中共政權成立後的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中，毛澤東不停地進行階級鬥爭，人們產生了疲沓厭倦。而鄧小平在毛澤東最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數度貶降，表現出他們間的分歧。這樣的分歧使得鄧氏迎合了黨員與群眾的要求，在毛澤東逝世後順利地成爲毛澤東的真正繼承人。

他一獲領導權，立即宣佈目前與今後的階級鬥爭，不同於過去。同時強調「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方針（註三），從鬥爭的程度上升階級鬥爭。又宣佈批揭「四人幫」的運動已經結束；隨後再強調不搞群眾運動，說群眾對「大規模的運動厭煩了」，每次運動都「要傷害一批人」，「安不下心來搞建設」（註四），從鬥爭的方法上升階級鬥爭。並且將黨的工作重點移轉到經濟方面，將階級鬥爭的地位降低，否定「階

級鬥爭爲綱」(註五)。

與此同時，強調法制建設，政治鬥爭「一定要在法律範圍內進行」(註六)。是即企圖以法治紀律來代替淡化了的思想、組織的控制鬆弛。

不搞群眾運動，除了淡化階級鬥爭以外，還認爲要維持安定團結這個「長期任務，我們就不能搞運動」(註七)。之外，更重要的是以此來淡化思想改造。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講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引用了毛澤東的話，但故意在「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之後刪掉了一句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註八)。原意是通過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這種群眾運動，使得領導者和群眾得出「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的認識，是故稱其爲「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就是通過這樣的認識改造；江澤民將此句話刪去，也就是使得它不再有思想改

造的作用，群眾路線成了單純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註九)。他的這種理解是依據鄧小平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合在一起作爲最根本的作風這種詮釋(註十)，是則可以說江鄧在不以群眾路線認識論，搞群眾運動來進行思想改造這種立場是一致的。

於一九九零年五月，中共中央在黨員民主生活中規定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思想鬥爭；七月一日江澤民發表文章要求改造主觀世界(註十一)。但冷冷清清的總是搞不起來，原因就是思想改造已經被淡化了。

對於國際主義的淡化，首先表現在鄧小平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作了一自我批評的講話，說：「我們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是反對得對了」。「但我們也犯點隨便指手劃腳的錯誤」(註十二)。這一種自我批評是指五十年代開始的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而這種批判，是基於國際主義

的責任，他的自我批判就意味著國際主義開始淡化。

一九九零年六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所有文件，只提及大陸範圍內的、大陸範圍外的兩個愛國統一戰線（註十三）沒有國際統一戰線。而一九八三年統戰部長楊靜仁的文章，就認為中共有互相支持的國際的、國內的兩個統一戰線（註十四）。

這一種國際統一戰線的取消，大概還受到六四鎮壓民主運動的影響。本來在國際上已經採取守勢，六四事件給西方藉口人權批評中共政權的機會，為著消滅由此方面帶來的封鎖，促使國際統一戰線的加速解體。

原受中共直接援助而由操國語的緬人為領袖的緬甸共產黨，已與緬甸政府和解，現在中緬邊境鴉片種植區協助禁毒，公開接受香港電視台的訪問（註十五），表示與政府、國際組織合作的真誠性。以馬來西亞華人陳平為首的馬來亞共產黨，已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泰國南部合艾鎮與馬來西亞、泰國兩國政府簽署協定，解散一千一百人的游擊部隊

（註十六）。

一九九零年八月八日，總理李鵬公開承認有一些印尼共產黨人在中國居留，但說他們年事已大，且已被中共禁止其作政治活動（註十七）。

中國周遭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除了菲共以外，現已不再見有武裝鬥爭活動了。一九九零年四月九日，菲共新人民軍副司令員卡瓦多和兩名菲婦從歐洲返回馬尼拉時被捕（註十八）。當時菲律賓輿論懷疑菲共活動經費的來源，去歐目的可能是尋求新的金錢支持，亦即說，中共已停止對菲共的金錢支持。

此外，世界輿論已集中注意伊拉克併吞科威特之後，中共與聯合國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國家採取同一立場，制壓侯賽因。這表現其在反霸方面的軟化。

當然，我們還需注意中共的一般輿論間中還提及國際主義，江澤民與李鵬還提到反霸權主義（註十九）。惟其如此，我們只能說是淡化而非取消。

去年二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爲文批評近年來黨內不敢講階級鬥爭，「不能講，還有些人是反對講」（註二十），似乎在抨擊鄧小平。六月，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首先說淡化黨的階級性（註二十一），之後，淡化一詞廣泛的被應用。黨的領導被淡化，意識型態被淡化、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馬列主義灌輸原則被淡化；有人說紡織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在一九八五年頂住淡化情況下成立的（註二十二）；最近則認爲在思想政治工作一片加強聲中被淡化，自己搞淡化、淡化黨的觀念、淡化黨員形象等等（註二十三）。總起來說，就是毛澤東思想被淡化。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指出思想、組織的控制鬆弛、「渙散軟弱」，是由於黨員認爲批評就是「打棍子」。去年，中共中央要求領導幹部過組織生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還是以不「打棍子」、不「整人」來推宕。《人民日報》社論就坦承這是「黨的領導被『淡化』」的結果（註二十四），但沒有

再進一步指出淡化是由鄧小平的淡毛「三不主義」的直接影響。

四項堅持與改革開放的矛盾

於政策層次，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設下了四項堅持的關閘，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由於他強調不搞群眾運動，淡化了階級鬥爭、思想改造，使得這四項堅持成爲單純的行政措施。是故一九八七年二月鄧小平論及學生運動，靠說服教育無效時，就須「採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註二十五）。

四項堅持的關閘作用，現已由於思想、組織的控制更加鬆弛，在經濟改革開放方面已呈半開閉狀態。

限制思想解放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首先要求解放僵化思想，

去除自由討論的箝制，強調「三不主義」，鼓勵敢想敢說的精神，但這四項堅持，就限制這種解放，包括他自己在內。例如，一九八八年六月，鄧小平與前總書記趙紫陽接見莫桑別克總統埃薩納時，就藏頭露尾地勸其要多發展私營經濟，不要搞社會主義，但不是公開正面的說（註二十六）。

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解放思想，來增強黨與行政機構的活力，消除大鍋飯，提高效率，調動群眾、企業的積極性和動力以發展生產力（註二十七）。一九八零年鄧小平說：「上面沒有指示就不敢動，這能叫解放思想？」（註二十八）組織改革六年以後，總書記胡耀邦亦說：全國幹部并未改變「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的被動狀態（註二十九）。其所以被動的基本原因是在於四項堅持中的堅持共產黨領導，不能反對離開黨的領導而鼓勵自發性（註卅），這是鄧小平自己說的。這怎能使被動社會變為主動？是即說，鄧小平所說的解放思想，是有特定範圍，其要改革開放的地方解放思想，并非

全面的解放思想。

馬列主義強調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的社會發展規律；毛澤東所強行的雖是貧窮化的社會主義，但卻有理論結合實際的事實表現。進行改革開放之後，由較高的社會主義階段退回初級階段。農村解放集體化了的人民公社，實行個體經濟的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并重新發展私營、個體經濟；但是在無實踐檢驗條件下而強調堅持與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不能不強詞奪理的實行灌輸、強迫（註卅一）。主管意識型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坦白承認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解釋得更貼近實際，群眾樂於接受，成爲一個大問題（註卅二）。惟其如此，就迫使中共幹部無法避免形式主義又「走過場」。

雖然四項原則對於解放思想的箝制在表面上是成功的，但一九八三年的異化、「人道主義」思想的傳播，一九八六至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的連綿不斷，則說明這箝制實際上是很脆弱的，不斷地在被

突破。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於天安門廣場上出動武裝坦克鎮壓，更顯示出箝制的失敗。

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矛盾

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但亦可能相反，上層建築逼迫經濟基礎變革，毛澤東時代就是如此。現在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了，上層建築應該隨之而改革（註卅三）。但是，政治方面的改革，始終未能同步展開，一九八七年六月鄧小平曾經推動（註卅四），同年十月，趙紫陽再在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談得很多（註卅五），一九八八年雖有些行動，但不久就此停頓了。這樣使得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間的矛盾擴大化。這一種矛盾主要是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經濟間的矛盾，是為經常出現的社會不穩定主要因素。

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

鄧小平談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是因為人口多，

生產落後，若實行資本主義，財富集中，許多地方連溫飽也解決不了（註卅六），這樣就要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來分配。而且，實行計劃經濟，是無產階級在經濟領域中的專政，有助於政治方面的專政。

農村取消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生產責任制是鄧小平的得意傑作，鼓動起了農民的積極性，也觸動了他的經濟實踐意識。雖然他在一九八零年一月，已經提到計劃經濟下「市場經濟調節的輔助作用」（註卅七），但不知道怎樣搞。他說經過農村改革，市場經濟「突然冒出」、「異軍突起」（註卅八），終於在一九八四年決定摸「老虎屁股」，進行城市改革，試行市場經濟（註卅九）。

一九八八年夏天大幅度開放市場物價，通貨猛烈膨脹，鄧小平在驚惶之餘，終於決定整頓，收緊市場物價。在是年九月全國有百分之五十的商品價格已經放開。次年六四事件後，中共政權加強控制，猛烈要求提高計劃分配份額，要將物資統統裝入計劃的籠子裡去（註四十）。但由於思想、組織的控

制鬆弛了，無法再收緊。一九九零年三月，上海的原材料由過去七成國家分配，降為兩成（註四十一）

。到十二月，全國的鋼、煤、木材和水泥由國家物資部門分配的分別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百分之四十三、百分之二十三及百分之十三（註四十二）。雖然這些數字並不齊全，但反映出了計劃分配份額在節節下降。幹部的計劃觀念非常淡薄，有令不行的情況愈演愈烈（註四十三）。企業對計劃定點訂貨遲疑拖延（註四十四），合同簽訂之後，兌現率亦低，一年不如一年。一九八九年頭八個月，鋼鐵的合同兌現率只有百分之八十七點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六點二個百分點（註四十五）。看來，市場經濟繼續擴大，已無可避免。

一九九零年九月，新任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陳錦華說：「不可能不應當什麼都用計劃去統管。」（註四十六）這就排除了將物資統裝入經濟籠子的設想。

農業的重新集體化

實行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之後，即佔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成爲個體經濟戶，這與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經濟爲主導的說法矛盾。而同時，這種個體經濟對計劃經濟的實行有礙。是即說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雖能提高生產積極性，但不利於統治，也衝擊著四項堅持。六四事件後，企圖改變這項農村制度的中央領導幹部逐漸抬頭。

一九八九年初，湖南省幹部藉口水災要求改變農村制度，被省委書記熊清泉否決（註四十七）。一九九零年五月全國農村普遍流傳農村政策要變（註四十八）。

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北京《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刊出元老、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走訪并推崇不實行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的河南新鄉縣劉莊維持與人民公社相似的生產制度。六月，總理李鵬要求農村建立產前產後的服務體系（註四十九），發

展規模經營集體經濟（註五十一）；同月，他與政治局常委宋平主持農村工作座談會；八月，宋平又主持一個全國農村村級組織建設工作座談會；兩個會議指無集體經濟的村是「空殼村」，號召以「當幫家」的新平均主義精神發展集體經濟，清除阻難集體保留的「釘子戶」，將原來重點置於家庭承包轉移到聯產，以加強以前從來未提出過的雙層經營（註五十一）。北京《人民日報》的本報評論員文章甚至於指責有些農村「黨組織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讓農民自發發展，後果是嚴重的」（註五十二）。大有取消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重新集體化的意圖。

實際在前幾年，鄧小平早就在強調，「農村政策不會改變，變了，八億農民會反對」（註五十三）。李鵬宋平的農村重新集體化提出以後，遭到農民的普遍反對；在不久以前，有一個省的農業廳長曾說：「一宣傳提倡規模經營，農民種田就不上糞了」（註五十四）。在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下旬，新華社記者對華東一百戶農民調查，安徽省鳳陽縣梨園村

農民陳興漢說：「莊稼人就是喜歡家庭承包責任制。有了它，我們種田就有幹勁」。報導著重的說，百分之九十二的農民贊同陳興漢的觀點，只要農村政策穩定，就願意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註五十五）。這就是說：如果改變「家庭承包責任制」、重新集體化，就不對農業投入。好像是要推動農業的「按章工作」，有糧吃就算了這種態度。

大概在十月裡，鄧小平出面阻止。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文件要求穩定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文件中雖又提到雙重經營制、集體經濟的發展。不過，我看這只是形式主義另一表現，農業之重新集體化是夢想。

私營、個體經濟

私營、個體經濟經過多年的改造鬥爭到一九七八年僅剩為數極少的個體戶，改革開放後准許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而重新發展。在六四事件之後，也曾經遭受到壓制有所收縮，一九九零年又恢

復發展，到該年十月，全國有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有一千二百九十八萬戶，從業人員二千零二十四萬人，註冊資金三百八十一億元。據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統計，資產在一百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有四百五十三戶（註五十六）。

上述數字是不準確的，因為他們怕刮「共產風」，怕政策有變，怕露富，怕沒有限制的攤派，賺了錢不敢存銀行，許多私營企業掛靠集體、全民，即使主管它們的國家工商管理局也說搞不清楚（註五十七），只是形式主義的統計。

允許私營企業發展但怕出現百萬富翁，鄧小平就多次這樣的說（註五十八）。有些幹部則擔心出現資產階級，支持民主化運動（註五十九）。

但是，使人驚奇的是上述四百五十三戶百萬富翁卻公開的存在著，據國家工商管理局的分析，實際大大超過此數；有人估計在四千以上（註六十）。

私營企業在這樣遭受壓抑心驚膽戰的情況下發展，反映其生命力極強。在大陸，任誰都知道，如

果沒有靠山，就沒有辦法經營私營企業（註六十一）。這也就是說，所謂私營企業實際亦應列入下述的特權資本主義經濟，且有為其開路的作用。可以預言其未來，儘管有著像四項原則之類的箝制，未必就能限制其發展。對於先富以後的均富，看來不是近年的事。這種脫離了思想、組織控制的靠山看來是強有力而且是眾多的。

對外開放

鄧小平強調其承襲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但認為他在執行時有若干程度的閉關自守，「吃過這個苦頭」（註六十二）。因此，要對外開放，是為前述淡毛基礎上結合於對外關係方面的應用。開放的目的是引進外國技術與資金建廠，加快經濟建設。

「有些老同志」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資本主義來」（註六十三）。鄧小平的答覆是，不管外資來多少，影響不了社會

主義公有制；並且不許帶來「腐朽思想侵蝕」，也不能讓「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氾濫（註六十四），「危險有一點，不大」（註六十五）。

到一九八九年夏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時節，他突然改了口風，說這個外來的「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結合起來，進行「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的動亂，在「一大批老同志」協助下鎮壓了下去。但「這批老同志」在反對對外開放方面卻軟弱無力，讓他再次強調中央的改革開放是對的，只不過堅持四項原則「不夠一貫」，「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要求作更大的對外開放（註六十六）。

本來這四項堅持對於對外開放是有箝制作用的，但鄧小平大力將之移轉去帶入資本主義思想這一方面，擴大對外經濟方面開放。

此外，另有一股力量反對沿海擴大開放，內陸各省因中央實行地區傾斜政策，先開發沿海然後帶動擴及內陸，這就使得內陸各省成爲原料與工業產

品低價供應區，遭剝削；經濟發展亦遭到壓制。從而反對沿海擴大開放。一九八八年十月西南五省區地方經濟區五十五個市長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重慶市副市長金烈憤激地說：中央提出沿海城市發展戰略本來是正確的，但有的沿海城市「以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爭奪內地市場」。他呼籲西南各市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沿海城市「在不平等條件下的競爭，逼使沿海城市真正下海」（註六十七）。

在這種壓力之下，一九八五年已經提出的上海浦東開放之議擱置了下來。鄧小平在六四鎮壓民主運動強調繼續擴大開放之後，一再對中央領導施加壓力（註六十八），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李鵬親自宣佈開放上海浦東（註六十九）。這一天宣佈大概是以中央政策不再向廣東、福建等南部沿海地區傾斜，轉向長江流域傾斜爲交換條件（註七十）。

既然無法阻止上海浦東的開放，內陸各省轉而要求也向外開放。一九九零年三月，四川省長張皓

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強調要求「讓四川走向世界」，「內陸省也要更加開放」。陝西省代省長白清才繼之，認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修正案的通過，「將成爲內地對外開放的催化劑」（註七十一）。隨著上海浦東開放的宣佈，北至黑龍江，西到新疆、四川，紛紛宣佈設立各種「經濟技術開發區」、「台商、僑胞投資區」，除抄襲中央給浦東十條優惠政策以外，許多省、市，還擅自增加優惠，名曰擴大開放。不少省市負責人則進京向中央要錢要優惠政策（註七十二）。李鵬在八月二日的全國工業生產工作會議上猛烈批評這種「一哄而上的局面，最後的結果可能是一事無成」，「各地不允許越權搞對外新聞發佈會，隨便提優惠條件」（註七十三）。

這一種在對外開放方面的中央與地方僵局，終於在中央讓步下解決。九月十三日，國務院召開西部地區政策會議，認爲公有制比重西部高於東部地區，要鼓勵合資、鄉鎮企業爭優惠政策在西部實行，

並且可以吸收東部和外國資金（註七十四）。十一月，中央再召開黑龍江、遼寧、吉林、內蒙、新疆等五個省區的工作會議，要求加快沿海開放步伐，形成東西互濟、南北呼應的對外開放兩個扇面（註七十五）。同時，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李鵬講「八五」及十年經濟發展規劃的思路，正式宣佈除浦東以外，今後的政策不向地區、而向產業傾斜（註七十六）。繼此，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的公報，不強調「要保持對外開放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除了要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好以外，還要「鞏固和發展現有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帶」（註七十七）。這也就是說，不分新舊，也不計中央批准或未批准，只要已經宣佈的都要「鞏固和發展」。顯然已是全國對外開放了。

這種全國的對外開放，李鵬曾圖箝制，但被聯合的地方力量所突破；這種地方主義之所以能夠成長，則又是思想、組織的控制鬆弛政治方面的發展。

異化經濟在發展

淡化毛澤東思想使中共的思想、組織的控制鬆弛，從而使經濟方面的計劃與農業集體化的舊制難以復歸，私營經濟、對外開放亦有某種程度的失控；政治方面則地方主義已有不尋常的發展，五千萬人一度在全國流竄（註七十八），數以萬計的群眾在各大城市舉行民主運動示威，參加游行的黨員數字之多使得中央領導震驚（註七十九）。這些思想、組織控制鬆弛的表現是明白易見的，而意義深遠隱藏不露的特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在飛速發展，卻不為人們所注意。

由於黨組織的「渙散軟弱」，鄧小平提出「一靠理想二靠紀律」，來加強團結統一（註八十）。但所謂理想就是共產主義，前已述及思想政治教育流於形式主義「走過場」。

這一種形式主義且普及到所有工作，特別是整飾紀律的工作。搞錢權交易的貪污分子認爲一陣風

吹得猛，躲過就無事了。搞清房工作「喊得兇、查得慢、實效差」（註八十一）。對於康華公司爲首的五大公司，要它們補交了五千多萬元稅款，就算了一百三十四名部長級幹部仍公然任公司職務，有人在全國人大擾攘，也漠然置之（註八十二）。領導幹部在台上大聲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於台下則津津樂道多黨制私有制（註八十三）；幹部下基層參加生產勞動如「蜻蜓點水」、「走馬看花」（註八十四）。一動「真格」是爲著「抓典型」上報（註八十五），將應該是普遍的作爲特殊案例來宣傳，這不是正常社會所應有。

在形式主義之下掩藏著的是對上面的政策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這種工作態度，隨之而來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註八十六）。

這一種對策結合起「一切向錢看」（註八十七），就形成爲依靠特權的資本主義，現已累積起來了它的經濟基礎。

幹部特殊化這樁事，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鄧

小平就已經談到，說有的幹部追求舒適生活，房子越住「越漂亮、越高級」，要求高級幹部帶頭發揚優良傳統，佔房不只一處的要退還（註八十八）。看來那時的特權有限。到一九八零年，有人提反「官僚主義者階級」，鄧小平承認有的幹部特殊化，但「決不是所有黨員或多數領導幹部都搞特殊化」，根本不可能成爲階級（註八十九）。

不過，之後各地中下級幹部也佔地建私房，據說在一九八四、八五年，曾將建私房風刹住，但一九八六年以後，建房之風再度掀起（註九十），此後雖然不斷的下令阻止、清理，但差不多夠權力的就建房，未能阻止。建房并不是爲自己住，有的是出租、出賣賺錢；有的甘願罰款退黨（註九十一）。因爲當幹部一世，也未必能賺一座樓房的錢。單在貧瘠的貴州省，於一九八七、八八兩年，各類建私房有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七起，面積四千四百九十五畝。其中機關幹部職工建的一萬四千起，佔地一千七百畝（註九十二）。處於中等地位的湖

北省，興建私房的國家幹部四萬八千零四十五人；鄂西某煙廠廠長建房六十多間，一千多平方米，造價二十七萬多元（註九十三）。有人對近三年發生的二十多萬件佔地的查處材料分析，以罰款了事的佔十九萬多件，有的每平方米僅罰款一元（註九十四）；這就是說，付了罰款所佔土地建的屋就合法化了，成爲封地。

根據如上資料來估計，全國佔地建私房的大概在二百萬戶以上，如計入地價，資產在百萬以上的大概會有萬戶。

在一九八九年初，全國有各類公司二十九萬九千個，到一九九零年七月，撤併了百分之三十五，即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七個，剩下十九萬六千八百二十三個（註九十五）。這些清理掉的公司，都是「影響不大的公司」（註九十六），一些高幹子女所主持的公司不在清理之列。這些未被清理的近二十萬個公司可能掩藏有十萬個以上的百萬富翁。

近年來，在廣東、福建新興的走私港口，幢幢

新樓連綿矗立，走私額動輒幾千萬元（人民幣），走私裝備則優於港澳兩地緝私警方（註九十七）。一九九零年上半年，查獲走私五千九百起，私貨價值二億八千萬元，百萬元以上的五十六起，走私範圍由廣東、福建向浙江、上海、青島、大連發展（註九十八）。據中新社報導，康華集團也涉及四川省重慶市海關查獲的百分之九十五走私案（註九十九）。這就是說走私不僅是在沿海，而且也在內陸；同時，前述的公司也兼營走私。憑走私起家的百萬富翁恐怕也不在少數。

當然，前節已述及的四個以上的私營企業百萬富翁也要包括在內。總合起來，百萬以上的富翁可能已在二十萬個以上。

如果根據汽車走私來看，這一估計大概是偏低的。

據《星島日報》記者實地調查，單只在廣東惠東縣港口鎮，每晚至少有兩部走私汽車上岸到埠（註一零零），一年計大概是六七百部。一九八八年

前十個月，湖南省工商部門查獲的違章汽車有四百一十七輛（註一零一）。一九八六年七月後的一年間，湖南省長沙市交通局幹部方喃喃倒賣進口汽車二十八輛，獲利六十四萬元（註一零二）。是即說從香港走私去廣東的汽車許多通過湖南北上。據說九成新的「新皇冠牌」在華南價值三十多萬港元，越是北上越貴，到新疆升值達七十多萬港元，供不應求（註一零三），這些買車者的資產當不會少過百萬元。如果一年中二百個百萬富翁買一部走私車，則百萬富翁在全國該有三四十萬個。

這裡還需注意的，是汽車在路上行走，難以隱瞞，是則說這些富翁的權勢已達炫耀於人肆無忌憚的程度。

由無產階級中之擁有特權者蛻化為資產階級，現在當然擁護無產階級政權，是為異化之第一步；俟後脫離無產階級而至反對無產階級政權，是為異化全程的完成。萬潤南（註一零四）所領導的四通公司在一九八九夏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當是特權

資本主義完成異化全程的先例。

本文所述自知不夠嚴謹，現正在從新搜集資料繼續研究，這裡先予發表之意見在於引起人們注意，從這方面著眼大家動手研究討論，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前途。

註釋

- 一、原文該是，不管黃貓、黑貓，哪一種方法有利於生產，就用哪種方法。這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至七月七日鄧小平在農業生產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九零年八月三日香港《文匯報》的文章有此校正。這裡仍用慣常較為明確傳神的說法。
- 二、安居自恣，佛家語。僧徒閉坐安居三月後，眾僧可揭其罪，并自作懺悔，是為自恣。
- 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香港三聯書店，1983年8月版。頁134、169。
- 四、《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44、308。
- 五、《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44至147，169。
- 六、《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36。《鄧小平同志編堅持四項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鄧反自由化）頁76。
- 七、《鄧反自由化》頁160。
- 八、1989年11月22日，香港《文匯報》。
- 九、1989年11月22日，香港《文匯報》。
- 十、《鄧小平文選》頁42。
- 十一、1990年6月30日，7月1日，北京《人民日報》。
- 十二、《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1987年2月至7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頁33。
- 十三、1990年6月12日，北京《人民日報》。
- 十四、楊靜仁《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北京《理論與實踐》，1983年第四期，頁5。

- 十五、1990年12月16至18日，香港電視廣播新聞。
- 十六、1989年12月3日，香港《文匯報》。
- 十七、1990年8月11日，香港《大公報》。
- 十八、1990年4月10日，香港《文匯報》。
- 十九、1990年7月9日，北京《人民日報》；1990年8月1日，香港《文匯報》；1990年8月29日，北京《人民日報》。
- 二十、1990年2月22日，北京《人民日報》。
- 廿一、1990年6月30日，北京《人民日報》。
- 廿二、1990年7月16日，11月5日，11月25日，北京《人民日報》。
- 廿三、1990年12月1日，12月3日，北京《人民日報》。
- 廿四、《鄧小平文選》頁344；1990年7月16日，北京《人民日報》。
- 廿五、《鄧反自由化》，頁156。
- 廿六、1988年6月14日，香港《文匯報》。
- 廿七、《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頁38至39。
- 廿八、《鄧反自由化》，頁60。
- 廿九、1985年7月9日，北京《人民日報》。
- 三十、《鄧小平文選》，頁156。
- 卅一、1990年7月9日，北京《人民日報》。
- 卅二、1990年4月30日，北京《人民日報》。
- 卅三、《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頁10。
- 卅四、《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頁37。
- 卅五、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香港三聯書店，1987年11月版，頁30至43。
- 卅六、《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頁5。
- 卅七、《鄧小平選集》，頁211。
- 卅八、《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頁35。
- 卅九、《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1月，頁62。
- 四十、1988年9月23日，北京《人民日報》；1989年9月1日，北京《人民日報》。

- 四十一、1990年3月10日，香港《文匯報》。
- 四十二、1990年12月7日，香港《文匯報》。
- 四十三、1989年10月24日，北京《人民日報》。
- 四十四、1990年8月17日，北京《人民日報》。
- 四十五、1990年10月24日，北京《人民日報》；
1990年9月25日，香港《星島日報》。
- 四十六、1990年10月15日，香港《文匯報》。
- 四十七、1989年12月17日，北京《人民日報》。
- 四十八、1990年5月22日，北京《人民日報》。
- 四十九、1990年4月5日，香港《文匯報》。
- 五十、1990年4月16日，香港《文匯報》。
- 五十一、1990年6月26日，8月18日，8月23日，
北京《人民日報》。
- 五十二、1990年9月13日，北京《人民日報》。
- 五十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頁50。
- 五十四、1988年6月7日，北京《人民日報》。
- 五十五、1990年12月13日，香港《文匯報》。
- 五十六、1990年12月25日，香港《文匯報》。
- 五十七、1989年10月3日，北京《人民日報》，報
導桂金民·集體牌子的私營企業，湘潭查出
1000多個，成都查出1900多個，瀋陽查出4700
多個。
- 五十八、《鄧小平選集》，頁153；《鄧小平同志
編堅持四項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頁155。
- 五十九、1990年2月22日，北京《人民日報》。
- 六十、1989年12月23日，香港《文匯報》。
- 六十一、例如，「蘭州蓓蕾書業」被攤派、罰款、
迫倒。1988年5月27日，北京《人民日報》。
- 六十二、《鄧小平選集》頁122，310；《鄧小平建
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頁33，55；《鄧小
平同志重要談話》，頁21。
- 六十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頁55。
- 六十四、《鄧小平選集》，頁372。

六十五、《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頁35。

六十六、《鄧小平同志編堅持四項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頁176至183。

六十七、1988年10月31日，香港《文匯報》。

六十八、1990年4月23日，香港《文匯報》。

六十七、1990年4月19日，北京《人民日報》。

七十、1990年4月30日，香港《文匯報》。

七十一、1990年3月27日，4月4日，北京《人民日報》。

七十二1990年8月15日，香港《文匯報》。

七十三、1990年10月9日，北京《人民日報》。

七十四、1990年9月14日，香港《文匯報》。

七十五、1990年11月10日，香港《文匯報》。

七十六、1990年12月2日，香港《文匯報》。

七十七、1990年12月31日，香港《文匯報》。

七十八、1989年2月26日，北京《人民日報》。

七十九、1989年10月17日，北京《人民日報》。

八十、《鄧小平同志編堅持四項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頁117。

八十一、1989年11月3日，1990年6月14日，北京《人民日報》。

八十二、1989年3月29日，北京《人民日報》，1989年8月30日，香港《文匯報》。

八十三、1990年11月15日，北京《人民日報》。

八十四、1990年8月13日，北京《人民日報》。

八十五、1990年9月16日，10月9日，北京《人民日報》；1987年12月6日，北京《人民日報》。

八十六、1988年10月31日，11月16日，北京《人民日報》。

八十七、1990年7月10日，香港《文匯報》。

八十八、《鄧小平選集》，頁188至189。

八十九、《鄧小平選集》，頁325至326。

九十、1988年11月16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一、1988年5月2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二、1989年11月12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三、1990年9月15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四、1990年7月17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五、1990年7月9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六、1989年8月1日，香港《文匯報》。
九十七、1990年12月24日，香港《明報》。除另註
者外，均為人民幣。

九十八、1990年8月17日，北京《人民日報》。
九十九、1989年2月15日，台北《中國時報》。
一零零、1990年12月20日，香港《星島日報》。
一零一、1988年11月17日，北京《人民日報》。
一零二、1988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日報》。
一零三、1990年12月20日，香港《星島日報》。
一零四、萬潤南前妻名劉濤，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
女；現妻李鈺，前中國科學院黨委書記李昌之
女。萬已於1989年6月逃出國外，已被舉為民
主中國陣線主席。1990年9月26日，香港《星
島日報》。

簡訊

河北省多位教會領袖於聖誕節前後被捕

據河北省的教友表示，為數約一百名河北省的天主教人士，於聖誕節前後先後被捕，其中包括保定教區的陳建章主教、師恩祥主教、史純潔主教、趙斯德主教；鄆邯的韓鼎祥主教及安世恩主教；易縣劉書和主教。到目前為止尚未聞有人獲釋。

山西及陝西兩省分別祝聖多批新神父

九零年八月至九一年元旦之間，山西太原修院及洪洞教區修院共三十五名畢業生，分先後七批在不同地區晉昇鐸品。這批年青神父投入工作後，山西省神職人員總數將接近一百名。

陝西省方面，十月二十一日及二十四日，也分別在三原及西安舉行了晉鐸禮，共有十一名西安修院的畢業生領受司鐸聖職。